国外清史研究

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的清史研究

Н. А. 萨莫伊洛夫 著　荆宇航 译

在 1917 年俄罗斯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汉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中国研究的经验。罗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列昂季耶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俾丘林（原名为 Н. Я. Бичурин，教名为 Иакинф，即雅金甫神父），卡法罗夫（原名为 П. И. Кафаров，教名为 Палладий，即帕拉季修士大司祭），扎哈罗夫（И. И. Захаров），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和其他 17—18 世纪俄罗斯优秀汉学家的作品经常被用来介绍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国，即清朝时期。这样，他们的著作为俄罗斯的清史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十月革命后的清史研究

1917 年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世界史研究由马克思 – 列宁主义理论这唯一的思想立场引导。这完全适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因为中国史学科已成为苏联世界历史学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使年轻学者逐渐取代在沙俄时期接受教育训练的东方学家，需要建立新的学术中心。这个学术中心就是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全俄（后称全苏）东方学协会，它根据 РСФС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ВЦИ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 年 12 月 13 日的命令组建，肩负着联合所有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家的任务。在 1922 至 1930 年间，协会出版了《新东方》杂志，甚至还出版了一套专著《为独立而斗争的东方》。协会的第一任领导者为魏利特曼（原名巴夫洛维奇 М. П. Павлович）——历史学家，作家，职业革命家。他在 1910 年代初还发表了几篇有关清末中国革命运动和辛亥革命事件的文章。①

从此时起，苏联的汉学家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革命运动、人民起义、劳动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当时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东方学协会主席巴夫洛维奇关于这一结论如是写道：“所有旧东方的过去，它的数百年形式不变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这一切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角度来解释。”②

在 1920 年代前半期，苏联开始出版以新的方法论角度写成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和文章，

［**收稿日期**］2017 – 09 – 10
［**作者简介**］Н. А. Самойлов（1955 – ），男，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教授；荆宇航（1990 – ），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819637494@163. com

① М. П. Павлович：《革命运动和当代中国的政党》，《复兴》1910 年第 6 期，第 17—34 页；М. П. Павлович《伟大的中国革命》，《同代人》1911 年第 11 期第 315—344 页。

② М. П. Павлович：《十月革命和东方的问题》，《新东方》，1926 年第 15 期，第 15—16 页。

其内容集中关注民族解放运动史。在这些具有主流框架书写特征的作品中，清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较为突出的是霍多罗夫和巴夫洛维奇的书《为独立而斗争中的中国》。[①] 作者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革命运动的主要阶段。

在 1923 – 1929 年发表于《新东方》杂志上的文章中，霍多罗夫研究了从 1644 年清朝建立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期间的中国历史的重要时间点。他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三个关键事件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②] 应当指出的是，霍多罗夫并不懂汉语，他主要使用以西方语言写成的史料。苏联汉学家已指出，“霍多罗夫的优点，就像他的一些同代人一样，并不在于新史料的发掘运用，而在于一些问题的新提法”。[③] 在此时就职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大学的屈纳[④]和哈尔恩斯基[⑤]的中国史著作中，清史的每个阶段都有所体现。

1920 年代末苏联的历史学家、汉学家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展开了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直接对立的观点。例如，休卡尔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具有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与之相反，波利亚科夫则声称，它只是一场暴乱。载入当时报告中最为主流的是斯科罗彼廖夫的观点，他表示，“太平天国革命”最主要的打击对象是封建主义，“因而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固有任务”，同时它也是民族运动，因为“它反对的是外族建立的腐败王朝（清王朝）”。[⑥]

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库丘莫夫所写的有关康有为的文章，[⑦] 它是苏联时期首批研究成果之一，专门讨论中国清末的改革运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依靠的资料来源有限，故这篇文章不可能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而认真的探讨。

如果说在 1920 年代除了几个关键事件外，苏联历史学家对中国国内历史的研究兴趣寥寥，对外交政策问题则相对给予了更大关注。这里，首先应该注意的是罗曼诺夫利用大量档案史料写成的重要专著《俄国在满洲》。[⑧] 罗曼诺夫成功地通过大量真实的档案史料展示了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沙俄政府远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揭示了日本统治集团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还探讨了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的必然性。1929 年，库尔茨所撰有关 16 – 18 世纪早期中俄关系史的书出版，此书也基于大量有关这一主题的档案文件和文献。[⑨] 几年后又出版了阿瓦林的大型专著《帝国主义在满洲》，[⑩] 此书的意义可与罗曼诺夫的作品相比。然而，如果说罗曼诺夫主要集中于沙俄政府的政策分析，且只涵盖相对较短的时间段，那么，阿瓦林则试图探讨相对较长的时间段中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

1934 年苏联历史学界出现了重大变化。1934 年 5 月 16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

---

① А. Е. Ходоров, М. П. Павлович：《为独立而斗争中的中国》，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东方科学协会，1925 年。

② А. Е. Ходоров：《满族统治中国的阶级根源》，《新东方》1929 年第 26—27 期，第 19—42 页；《中国的人民起义（十九世纪下半叶）》，《新东方》1925 年第 7 期，第 164—176 页；《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新东方》1927 年，第 18 期，第 64—90 页。

③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研究中国问题的苏联史学专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 年，第 94 页。

④ Н. В. Кюнер：《中国近代政治史纲要》，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书业出版社，1927 年。

⑤ К. А. Харнский：《从古到今的中国》，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书业出版社，1927 年。

⑥ 《Скорпилев 同志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报告》，《中国问题》1929 年第 1 期，第 407 页。

⑦ В. Н. Кучумов：《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自由主义（康有为和百日时代）》，《革命的东方》1927 年第 1 期，第 83—111 页。

⑧ Б. А. Романов：《俄国在满洲（1892—1906）》，《专制政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对外政策史纲》，列宁格勒：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出版社，1928 年。

⑨ Б. Г. Курц：《16、17 和 18 世纪的中俄关系》，哈尔科夫：乌克兰国家出版社，1929 年。

⑩ В. Я. Аварин：《帝国主义在满洲》（1 – 2 卷），莫斯科 – 列宁格勒：国立出版社，1934 年。

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在苏联的学校中教授国内史。"这一决议恢复了中学和高等院校中的国内史教学，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小组，在小组中"国内史的相关表述"不能用抽象的社会学方法替代。对个别国家的历史研究制定了新方法。这一切不可能不对苏联的中国史研究带来积极影响。苏联开始出现一些著作专门致力于研究之前所没有注意到的那些时期的历史。

1935 年 4 月，年轻的列宁格勒学者杜曼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进行了题为《十八世纪晚期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的论文答辩并获得了历史学副博士学位，第二年他的论文就出版了。① 这项以当时完全没被探讨过的题目为对象的研究，以大量源自中国的原始档案材料为基础。同时，西马诺夫斯卡娅研究了一些涉及清廷入主中原原因的问题，并在自己的博士论文《李自成的崛起（来自中国 17 世纪的农民战争史）》中突出了这些问题，在此基础上她在 1950 年代筹备并出版了自己的专著。②

战前几年，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卡拉－穆扎教授在莫斯科工作，任教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1941 年他写的太平天国的书籍出版，该书成为当时苏联汉学界的显著成果。③ 作者收集了这段人民起义历史的大量相关材料，详细描述了土地纲领，探讨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运动的不同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卡拉－穆扎是最先表示反对夸大太平天国起义中的种族（民族）因素的学者之一。他建议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这个运动的阶级性上，并如是写道："不能单纯地过高估计汉人与满洲人关系中的民族因素。反满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满洲人成为了汉人的剥削者、农民的阶级敌人这个事实。"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中国史研究的深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之后，苏联对中国的兴趣开始迅速增长。其结果是苏联的中国学研究大幅度增加。

苏联学者最感兴趣的是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发展的问题，然而中国史研究也成为优先方向之一。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叶菲莫夫教授所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在此书的第一版中，中国史的叙述截止到 1945 年，⑤ 那么在第二版就已延伸到了 1950 年并且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⑥ 此书引起了苏联国内外的极大兴趣，被翻译成了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日语，并部分节译为汉语。此书的书写精神在于探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关键性问题，其中甚至包括一小段清朝时期。

1950 年代与 1960 年代之交，苏联汉学出现了从中国史研究的"概论"时期向撰写基础性专题研究著作的转变。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齐赫文斯基著《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改革运动和康有为》的出版。⑦ 作者以包括此运动参与者的作品在内的中国史料为基础，研究了自由主义改革运动的起源、改革者的观点、在 1898 年试图实施的改革方案和运动失败的原因。齐赫文斯基还有机会使用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提供的一些康有为尚未发表的作品。作者能够指出改革运动的

---

① Л. И. Думан：《十八世纪晚期清（满）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36 年。

② Л. В. Симоновская：《1628—1645 年中国伟大的农民战争》，莫斯科：国家教育出版社，1958 年。

③ Г. С. Кара－Мурза：《太平，1850—1856 年伟大的农民战争和太平天国》，莫斯科：国家教育出版社，1941 年。

④ Г. С. Кара－Мурза：《太平，1850—1856 年伟大的农民战争和太平天国》，莫斯科：国家教育出版社，1941 年，第 34 页。

⑤ Г. В. Ефимо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莫斯科：国家政治图书出版社，1949 年。

⑥ Г. В. Ефимо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二版），莫斯科：国家政治图书出版社，1951 年。

⑦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改革运动和康有为》，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59 年。

进步性和爱国性，并同时指出运动领导人的矛盾性。他把注意力转向该运动内部不同集团和派别的存在。在齐赫文斯基的书中多处出现对康有为乌托邦式的社会理论“伟大的团结社会”（大同）的探讨。1962 年此书被翻译成中文。①

与此同时，苏联的中国史学家们从研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政策转向更深入的对大清帝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通过答辩之后以专著的形式出版的叶菲莫夫的博士论文。② 作者根据对已出版的清代外交文件和俄罗斯档案材料的研究，详细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活动。有关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章节占据了书中相当大的篇幅。这场战争成为断定清政府软弱无能的明确标志，且在此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力剧增。通过分析战前和战时清政府的外交手段，以及清廷在下关和谈时期的表现，作者揭露了清政府的弱点。

当时，苏联学者开始研究清代的中俄关系史。那时候出版了一些有关两国关系建立的有趣著作。这一系列的书中首推雅科夫列娃的《1689 年中俄第一个条约》。③ 这本专门研究尼布楚条约签署情况的书，是基于大量苏联国立中央古代文书档案馆（ЦГАДА）藏的档案材料写成的。这本著作探讨了中俄关系产生和发展的最早时期，包括 17 世纪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俄罗斯使节的活动。作者的注意力集中于尼布楚谈判期间和尼布楚条约本身。该书首次公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几年之后杰米多娃和米亚斯尼科夫的有关使节伊万·佩特林和费奥多尔·巴伊科夫的书问世了。④此书旁征博引，除了已出版的佩特林和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各两个版本）的文本外，还包括一些内容丰富的介绍性文章和科学评论。这本书在中国史史料学的发展中是一个重大贡献。斯拉德科夫斯基从事中俄经济贸易关系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之一研究的就是清朝时期的这种经贸关系。⑤

在 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初苏联学者对清末的革命运动史特别感兴趣，如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恰好那几年庆祝了辛亥革命 50 周年和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在 1950 年代末出版了几本有关这一主题的著作：别洛夫⑥、达尼洛夫⑦、叶菲莫夫⑧等人的书。在这些作者之间有一场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它到底是上层社会的还是人民大众的革命，资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有对革命史年表框架问题的讨论：一些作者认为，辛亥革命完成于君主制被推翻、清王朝灭亡的 1912 年；另一些作者则认为，革命结束于 1913 年尝试推翻袁世凯独裁统治行动的失败和中国各地区群众运动被镇压之后。可以把齐赫文斯基的致力于研究孙中山外交政策观点的书列入有关这一主题的系列著作中。⑨ 这本苏联著名汉学家的书，是作者基于中文、英文、俄文和日文的多种材料，经过多年研究而获得的成果。

1964 年出版了翻译成俄文的孙中山作品选集，其中许多是首次出版。⑩ 选集以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出版的中文文本为底本进行编排。这些都发生在齐赫文斯基的介绍性文章之前，在此文

---

① 齐赫文斯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三联书店，1962 年。

② Ефимов Г. В.：《中国的外交政策（1894—1899）》，莫斯科：国家政治图书出版社，1958 年。

③ Яковлева П. Т.：《1689 年中俄第一个条约》，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8 年。

④ Н. Ф. Демидова，В. С. Мясников：《在中国的第一个俄国外交官（И. Петлин 的《详细笔记》和 Ф. И. Байков 的《出使报告》）》，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 年。

⑤ 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俄中贸易经济关系史（至 1917 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 年。

⑥ Е. А. Белов：《1911—1913 年的中国革命》，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58 年。

⑦ В. И. Данилов：《中国革命同盟会和它在 1911—1913 年革命筹备中的作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59 年。

⑧ Г. В. Ефимов：《1911 年的中国革命》，莫斯科：国家教育出版社，1959 年。

⑨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孙中山：外交政策观和实践（1885—1925 年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史）》，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4 年。

⑩ 《孙中山作品选集》（译自中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 年。

中他详细介绍了孙中山观点和想法的发展变化。在孙中山 100 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苏联还出版了有关这位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的文章、回忆录和史料的汇编。①

那时，在 1960 年代初，《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作品选集》被翻译成俄文并得以出版。② 这部书包括 1840 至 1898 年期间一系列中国思想家作品的译作，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甚至还包括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的作品。这本选集的出版使得苏联读者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一大批中国十九世纪作家的作品。

与此同时，苏联汉学家继续积极研究中国的人民运动史。1967 年伊柳舍奇金的专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出版，③ 此书详细且系统地描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全部历史。作者使用了大量中国的史料，甚至还包括了当时中国、苏联和西方学界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因此，伊柳舍奇金才能阐明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问题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想法。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太平天国内部领导层的斗争问题，这个问题导致 1856 年发生严重冲突并使得许多起义者丧生。早在 1940 年代卡拉–穆扎在自己有关太平天国的书中就对此冲突如是写道："这不是为了权力而进行的个人斗争，这场斗争反映了不同阶级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阶级矛盾。韦昌辉背后是商人—贵族的势力。"④ 同时，如杨秀清者，在卡拉–穆扎看来，他代表广大农民群体、手工业者和城市贫困者的利益。许多其他苏联历史学家都持有类似的观点。但伊柳舍奇金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他的推测：1856 年的冲突并不具备阶级性，也不是个人野心的产物，而是不同家族利益冲突的结果，还是区域集团之间矛盾的表现。

除了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外，苏联汉学家在 1960 年代开始积极探讨清代的其他民众运动。切卡诺夫发表了一系列最终以专著形式出版的有关 1853—1868 年捻军起义的论文。⑤ 在基于包括起义文件和起义领导者赖文光的《自传》在内的中文史料写成的作品中，切卡诺夫描绘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起义画面，阐释起义的过程和军事行动的特点，并试图解释起义失败的原因。在切卡诺夫看来，捻军起义在组织、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表现明显弱于太平天国运动。他对此的推论是，捻军虚弱的原因是"土匪流寇"式的流氓因素在他们中的影响。在分析为什么太平军和捻军之间没有统一行动的问题上，切卡诺夫写道，"太平军接近捻军只为军事援助，而忽视了对捻军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的必要性"。⑥ 捻军运动的性质主要是反政府而不是反封建，切卡诺夫解释说，绅士在这场运动的领导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60 年代波尔什涅娃开始研究 18–19 世纪在"白莲教"领导下进行的重大民众起义。⑦ 她在自己的专著中⑧总结了她先前的研究并着重研究此次运动的意识形态。在作者看来，1796—1804 年民众起义具有反封建并多少带有民族独立的性质。波尔什涅娃以中文史料为基础，设法说明"白莲教"教义在 1796—1804 年民众起义的意识形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在研究中，波尔

---

①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孙中山百年诞辰——文章、回忆录和资料汇编（1866–1966）》，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 年。

② 《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作品选集（1840—1898）》（译自中文），Н. Г. Сенин 译，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 年。

③ В. П. Илюшечки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莫斯科，1967 年。

④ Г. С. Кара–Мурза：《1850—1856 年伟大的农民战争和太平天国》，莫斯科：国家教育出版社，1941 年，第 105 页。

⑤ Н. К. Чеканов：《1853—1868 年中国的捻军起义》，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 年。

⑥ 同上，第 160 页。

⑦ Е. Б. Поршнева：《1796—1804 年的民众起义》，《亚洲人民研究所简讯》第 53 辑，莫斯科，1962 年，第 78—94 页。

⑧ Е. Б. Поршнева：《"白莲教"教义：1796—1804 年民众起义的意识形态》，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 年。

什涅娃将“白莲教”的历史和教义的特点置于重要位置。在 1950 – 1960 年代苏联历史学家们也从事清朝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起义的研究。1959 年苏山罗有关十九世纪下半叶东干族（回族）起义的专著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版。① 在这稍前易卜拉欣莫娃②和谢洛夫③所写的有关 1860 – 1870 年发生在新疆的起义的论文通过了答辩。

1966 年苏联出版了一个包括 18 篇文章的汇编《满洲在中国的统治》。④ 该书涵盖了清朝时期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各方面：从土地关系的特点和清朝时期中国社会的特征到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齐赫文斯基的长篇介绍性文章对满清王朝政权体制的特点和实质进行了详细描述，展示了苏联学者对此时期中国历史研究的成就，还突出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汇编中的一些作者集中探讨了满族在征战和建立清朝统治的过程中受到来自汉族人民阻力的实际情况。汇编用主要篇幅描述反清起义（如，1787—1788 年台湾起义，在“反清复明”口号下 18 – 19 世纪早期中国秘密社会的反抗，1906—1907 年在秘密社会红江会领导下的萍浏醴起义等）。

1960 年苏联历史编纂学所侧重的清朝统治的一般特征，在齐赫文斯基发表在权威历史杂志《历史问题》上的重要文章《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得到确切表达：“267 年——从 1644 年 10 月 30 日至 1912 年 2 月 12 日——满族的清王朝统治着中国。清王朝的统治时间包括了几乎整个近代历史时期。在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同荷兰人一起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新的时代格局——资本主义时代的同时，满族人确立了在中国的统治，并通过镇压汉族和其他民族将其并为他们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切只是在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五年前才告终结。在这两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面临国内各种矛盾和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但当时的中国是高度发展的封建主义主权国家。这之后却沦为世界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农业和原材料附属国，只是因为帝国主义之间急剧增长的矛盾和大国之间的竞争才使中国保持了独立国家的表象。只有通过激烈斗争突破封建主义的障碍和限制才能开辟出自身发展道路的资本主义成分，在清朝统治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并未取得主导地位。”⑤

在谈及中国清朝的历史分期时，当时的苏联汉学家将清史分成了以下四个基本时间段：1. 从满族入关占据北京到清王朝的机关、制度在前明朝时期所确立的中国疆域内建立（1644—1683 年）；2. 中国清朝政权内部相对稳定并对喀尔喀蒙古可汗、俄罗斯在黑龙江流域的居民点、准噶尔汗国、西藏、新疆、越南、缅甸和尼泊尔等地进行远征的征服时期（17 世纪 80 年代到 18 世纪 70 年代）；3. 清朝内部腐化并在由中国秘密社团领导的农民战争和帝国非汉族民众起义（苗族、回族、壮族、侗族、彝族、傣族等）的打击下持续衰弱的时期，甚至还有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18 世纪 70 年代到 19 世纪末）；4. 最后的阶段，当清王朝在表面上保持着统治地位却在实质上成了封建买办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顺从的工具的时候，清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其君主制最终被辛亥革命推翻（从 1894—1895 年中日战争到 1912 年 2 月清帝退位）⑥。

---

① М. Сушанло：《十九世纪下半叶东干族起义和白彦虎在其中的作用》，伏龙芝：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出版社，1959 年。

② Г. М. Ибрагимова：《满洲国家在新疆和 1864—1878 年的民众起义》（利用维吾尔族史料），列宁格勒：国立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1954 年。

③ С. И. Шихов：《伊宁起义（1864—1871 年）》，莫斯科，1954 年。

④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主编：《满洲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 年。

⑤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历史问题》，1966 年，第 9 期，第 71 页。

⑥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С. Л 齐赫文斯基作品选集》，五卷本，第 1 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77—478 页。

1970－1980 年代的清史研究

1960—1970 年代之交苏联历史学家转而探讨“自强”政策（洋务运动）在 19 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中的作用。齐赫文斯基成为苏联中国史学家中最先发表有关 1860—1895 年改革运动的文章的人之一。[①] 在文中他给中国的“自强”政策做如下评价：“在此期间，中国的统治阶层宣布‘自强’政策，试图通过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对国家机器和军队装备进行细微改革以巩固自己对帝国民众的统治。”[②] 1970 年代齐赫文斯基的这篇文章收入他的《中国的历史和当代》一书中。[③] 他认为，该时期中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建立和新意识形态的出现。齐赫文斯基还在发表的文章中同中国历史学家牟安世展开争论，在他看来，牟安世将“自强”政策的评价仅仅限定在了工业发展领域；同时他还同西方历史学家玛丽·莱特（Мэри Райт）和艾伯特（Альберт Фейерверкер）争论，认为他们美化了 1860－1890 年代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在“自强”政策和改革计划期间产生的中国思想意识领域的斗争问题被当时列宁格勒汉学家萨莫伊洛夫在其硕士论文和其他文章中提出，而中国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如冯桂芬、马建章、郑观应和郭嵩焘等人的观点在其中也有所反映。[④] 这是苏联汉学界第一次讨论这个题目。

1970 年代，苏联汉学家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兴趣大为增涨。在这方面涅波姆宁作出的贡献最大，出版了两本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专著。[⑤] 其著作的特点不仅仅在于使用了包括大量相关统计数据在内的丰富的客观史料，还在于它有内涵丰富的结论和概括——有趣的，虽然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且引起了其他国家汉学家的置疑和反对。在第一本书中，涅波姆宁就评定 19 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为“落后农业国的封建儒家官僚土地租赁制度”。[⑥] 在他看来，1860—1890 年代中国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城市中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手工业生产方式走向毁灭，通过商品流通刺激了自然经济的剧烈变化。民族工业兴起，这也涉及“自强”政策本身。在涅波姆宁看来，这一政策“主观上并非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接受，而是对它的畏惧”。[⑦] 在第二本专著中，涅波姆宁断言，清朝在中国的统治最终将在质上催生出一个新的社会——“过渡的”，[⑧] 其中一方面传统结构逐渐出现衰败和腐化，而另一方面——受制于新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缓慢。

1970 年代初，苏联汉学家作品中有关辛亥革命背景的研究占据主要位置，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结束了中国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君主制度的辛亥革命，成为一个标志着开始向历史发展新时代迈进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促进了大量有关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文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出版。

在此期间，莫斯科汉学家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辛亥革命发生前夕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前夕思想政

---

①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中国统治阶层的“自强”政策（1860—1895 年）》，《历史问题》1969 年第 4 期，第 78—98 页。

②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中国统治阶层的“自强”政策（1860—1895 年）》，《历史问题》，1969 年第 4 期，第 78 页。

③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中国的历史和当代》，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 年。

④ Н. А. Самойлов：《十九世纪 60—8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方面的中国进步思想家（国家观念的形成问题）》，《现代东方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问题》，莫斯科：1983 年，第 36—46 页；Н. А. Самойлов《中国“自强”政策期间的社会政治思想冲突》，《世界历史和东方》，莫斯科：1989 年，第 115—124 页。

⑤ О. Е. Непомнин：《中国经济史（1864—1894）》，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 年。О. Е. Непомнин《中国社会经济史（1894—1914）》，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 年。

⑥ О. Е. Непомнин：《中国经济史（1864—1894）》，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 年，第 230 页。

⑦ О. Е. Непомнин：《中国经济史（1864—1894）》，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 年，第 177 页。

⑧ О. Е. Непомнин：《中国社会经济史（1894—1914）》，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 年，第 264—265 页。

治领域的斗争。博罗赫在《中国的兴中会》一书中对最早的时期进行了阐述。① 他在书中探讨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从成立到1900年（也就是和改革派决裂的那一年）的早期活动。这本书关注的焦点是兴中会建立的历史、它的革命纲领和1895年发动的广州起义。不可否认，西方的思想和学说，尤其是基督教对孙中山进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同时作者还仔细探讨了中式教育甚至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孙中山世界观的影响。此书出版之后，对兴中会建立的描绘变得更为突出和多样。作者对首批中国革命者和改革者的关系问题也予以高度重视。

同时格里戈里耶夫在对1895–1905年的中国革命报刊、文件和中国革命领袖的著作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写成的著作中,② 试图分析革命派领袖的外交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主题研究的发展是由齐赫文斯基开始的。与西方一些汉学家坚信晚清时期中国革命运动的主要目标为反满不同，格里戈里耶夫认为，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政策了。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仅引用了孙中山的文章，还仔细分析了陈天华、邹容、章太炎和杨毓麟（杨守仁）等人的所有著作。

科斯佳耶娃在《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③ 一书中探讨了人民大众的暴动，这些暴动是“自发地并在很大程度上孤立于自觉的民主运动之外”进行的（人民起义，排外的、反政府和抗税的暴动）。作者特意没有把革命团体和自由组织领导的起义，其他群众运动以及“保路运动”和对外抵制纳入研究中。作者以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与她书中所阐释的许多材料相矛盾。例如，科斯佳耶娃断言：“人民大众并没有直接参与辛亥革命……革命者利用他们抽象的口号和肤浅的土地纲领无法动员群众参加革命。”④ 与此同时，作者在此书的其他地方写道，以推翻清朝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辛亥武装起义，“客观上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建设性的民主运动结合在一起，最终推翻了中国的帝制并建立了共和国”。⑤ 可以说，除去所有对作者所作结论的争议，科斯佳耶娃这本书在收集大量的客观史料上还是很有价值的。

丘多杰耶夫致力于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晚清自由宪政运动的研究。⑥ 作者分析了19世纪末改革运动的演变及其领导人，并得出了结论：20世纪初形成了清政权的反对派——以江浙为中心的君主立宪运动（张謇集团等）。丘多杰耶夫利用大量真实史料研究这些问题，包括中文史料、当时的报刊、俄罗斯档案史料和西方的出版物等。他在书中研究了一系列由该运动成员组成的请愿团体，他们意图通过请愿创造“宪政社会”。作者并不认同那些认为这场宪政运动只具有反动性的观点，他强调运动参与者在清政府地位衰弱过程中的贡献。在此情况下作者所下结论是，在辛亥革命开始的时候自由主义立宪派就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组织和政治机构（省谘议局），并能够利用这些发生在1911–1913年的事件从革命者手中夺取主动权。

1971年，别洛夫出版了有关武昌起义的准备情况和进程的书。武昌起义给清王朝的地位带来了决定性打击，并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开始。⑦ 作者在撰写此书时利用了大量的特别是中文的史料。中国出版的八卷本辛亥革命史文献汇编给了作者最大的帮助。此书对革命前夕湖北革命运动的全貌进行了详细描绘，仔细探讨了武昌起义的进程，描述了湖北随后发生的事件。然而，书中的概念部分引来一些苏联历史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作者高估了起义准备时期湖北革命者的作用和全中国范围内湖北革命中心的意义，而低估了当时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联盟（同盟会）在这

---

① Л. Н. Борох：《中国的复兴联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1年。

②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帝纲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

③ А. С. Костяева：《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

④ А. С. Костяева：《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第109页。

⑤ А. С. Костяева：《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第46页。

⑥ Ю. В. Чудодеев：《1911年中国革命的前夕——自由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宪政运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

⑦ Е. А. Белов：《中国的武昌起义（1911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1年。

方面所起的作用。尼基福罗夫写道："就像不能对湖北革命者在武昌起义前期准备工作中的贡献保持沉默一样，同样不能淡化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政党在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做全面准备所起的作用，而在这个大范围内武昌只是诸多地点之一。"①

1974 年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远东国家历史教研室主任叶菲莫夫教授的著作《孙中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版。② 在书中作者试图综合所搜集到的材料，对苏联汉学家提出的诸多问题予以解答。除了辛亥革命事件本身，作者还细致描述和分析了之前清王朝深处反抗运动纷起的危机时期。书中详细探讨了以下几个涉及清末事件的问题：联盟（同盟会）的建立，1906—1908 年的革命运动及其对于之后历史事件的意义，1908—1910 年革命和反对派团体的活动，武昌起义前夕革命者的活动。叶菲莫夫利用了大量中文、俄文和西方语言的史料，其中包括大量的苏联档案处和英国国家档案局档案库所存档案文件。

在此时的苏联汉学家中，研究晚清中国社会思想成为了一个重要趋势。此领域中最先出版的是郭肇堂（А. Г. Крымов）依据原始中文史料写成的《中国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斗争（1900—1917）》。③ 这些史料即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潮最突出代表人物的著作：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章炳麟，蔡元培，朱执信，李大钊。郭肇堂成功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展现了 20 世纪早期社会思想的不同流派在中国的存在，并揭示了在此期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性质。郭肇堂将注意力集中于孙中山的纲领与章炳麟（章太炎）的观点之间的深刻矛盾上，称章炳麟的思想为"反动哲学"。④

沃洛霍娃研究在华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并出版了相关专著。⑤ 此书最重要的部分是注重晚清时期中国境内传教士的活动。此作品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利用了各个教会组织的出版物，在中国居住很久的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有关与外国政府交涉的中国官方公告文件和中国反洋教团体的宣传材料，如有关 1906 年南昌起义的材料，以及来自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的档案文件。按照当时苏联历史编纂学所采用的概念，沃洛霍娃得出的结论是："外国传教士已成为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在中国境内的重要工具，利用他们完成对中国人民最后的奴役，教育中国的年轻一代在心理上对压迫表现顺从和不抵抗。"⑥ 她还写道，中国反对传教士的暴动具有自发的性质，最终结果是人民大众既对传教士的行为不满，也对清政府的政策不满。

扎林娜和利夫希茨的专著关注西方列强在晚清时期的殖民扩张问题。⑦ 此书利用大量俄文和英文档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义和团运动》档案汇编中的材料。

可以说，在 1960—1970 年代之交苏联史学界对中国清朝时期的历史研究兴趣陡增：出现了大量的论文、书籍和文章。这一趋势直到 1980 年代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清朝统治将要结束的那几年（19 世纪下半叶——20 世纪），并且基本上都在研究人民起义、革命运动、西方列强的扩张，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其余的主题仍然在苏联汉学家的视野之外。这种趋势在当时苏联的中国史作品中都清晰可见。

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出版。⑧ 实际上，这本集体撰写的专著所研究的历史时间框架，同清朝历史是相吻合的。对此，齐赫文斯基在开篇写道："苏联中国史学家的集体作品《中国近代史》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世界历史重要时期上。众所

---

①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有关武昌起义》，《远东问题》1972 年，第 3 期，第 195 页。
② Г. В. Ефимов：《孙中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 年。
③ А. Г. Крымов：《中国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斗争（1900—1917 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 年。
④ 同上，第 261 页。
⑤ А. А. Волохова：《在华外国传教士（1901—1920 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 年。
⑥ А. А. Волохова：《在华外国传教士（1901—1920 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 年，第 130 页。
⑦ Л. Л. Зарина，С. Г. Лифши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1896—1901 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 年。
⑧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 年。

周知，近代史的时间框架是：一端是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它标志着欧洲资本主义成功的开始；而另一端——1917 年俄罗斯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① 在这种情况下，如齐赫文斯基所说，与近代史时期的开端（十七世纪 40 年代）同一时期，清朝在中国确立了统治，其统治时期直到 1917 年前不久才宣告结束。因此，《中国近代史》一书实质上是清朝的历史。这本书引起了苏联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许多汉学大家（梅利克谢托夫，② 别列兹内，叶菲莫夫，③ 杰柳辛，④ 米亚斯尼科夫⑤）对此书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然而，由于前文提及的原因，这套集体著作的作者们的注意力都基本集中于清朝统治的后期：全书中只有约 100 页分配给了 1640—1840 年这 200 年时间，而 1840—1911 年这段时间则占据了 400 多页。在霍赫洛夫撰写的第一部分，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17—18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土地关系和反抗清王朝的人民起义上。第二部分作者为伊帕托娃、伊柳舍奇金和齐赫文斯基，致力于西方列强向中国渗透的历史、由“鸦片”战争引起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自强”运动。第三部分（作者为：齐赫文斯基，博罗赫，卡柳日娜娅，格里戈里耶夫，丘多杰耶夫，别洛夫，科斯佳耶娃，涅波姆宁）为改革运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民主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义和团运动以及清廷的“新政”。第四部分（作者为：别洛夫，涅波姆宁，郭肇堂）包括推翻清朝帝制时期。作者的名单再一次说明，《中国近代史》是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当时苏联优秀汉学家数年前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成果。霍赫洛夫和涅波姆宁所写的章节，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清代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在晚清时期演变的特殊性的认识。此书很详细地介绍了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情况。

应当承认，清史中的前两百年在当时的苏联历史学科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上述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处在苏联中国史学家的视野之外。但是，平心而论，应该注意到，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有一个谢马诺夫所写的附录，题为《近代史时期的中国文学》。此文探讨了清代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提到了一些主要作家和当时存在的文学体裁。

很明显，当扩大了研究问题的范围且学者开始关注之前处在他们关注范围之外的课题时，《中国近代史》一书的出版本身就标志着苏联中国史学界中国史研究新阶段的开始。苏联汉学家所写有关中国清朝的科普体裁的出版物引起了苏联读者的极大兴趣。这就是谢马诺夫的书《慈禧太后的生活》⑥ 和西季赫苗诺夫的作品《中国的满族统治者》⑦。这些书详细描述了清帝国宫廷生活的许多方面：皇帝和皇后的性格，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清朝行政管理方式的特点。

清帝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许多苏联汉学家的研究专门讨论清朝时期的外交政策史。1977 年专门探讨清代最早期外交政策的集体著作出版。⑧ 编写小组由著名汉学家杜曼主持，成员包括博克夏宁，麦利霍夫和叶尔

---

①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主编：《中国近代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 年，第 5 页。
② А. В. Меликсетов：《有关中国史的新著作》，《真理报》1973 年 10 月 10 日。
③ Л. А. Березный，Г. В. Ефимов：《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史重要阶段的书》，《历史问题》1973 年第 10 期，第 144—158 页。
④ Л. П. Делюсин：《十七世纪 – 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的若干研究结果——致〈中国近代史〉的出版》，《亚非各民族》1973 年第 5 期，第 67—80 页。
⑤ В. С. Мясников：《清帝国的兴衰》，《远东问题》1973 年第 3 期，第 203—207 页。
⑥ В. И. Семанов：《慈禧太后的生活》，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 年。
⑦ В. Я. Сидихменов：《中国的满族统治者》，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 年。
⑧《十七世纪清帝国的外交政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 年。

马琴科。此书探讨：清朝对朝鲜和蒙古关系中的政策，漠南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的并入，以及对准噶尔（卫拉特）关系中的政策。有独立章节描述了 17 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同越南的关系，以及对俄罗斯关系的政策和 1689 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杜曼在《十七世纪清帝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一章中指出：这个政策的思想基础是古代天子（皇帝）的统治理念，此政策不仅适用于“中国”，还适用于天子按照上天的旨意所统治的全天下。新王朝清朝心甘情愿地采用了这一理念。本书的作者们以在实践中执行该理念的视角，研究 17 世纪清朝的所有政策。杜曼如是写道：“清代的中文史料，包括外交文件，都在不断强调，与满族国家有官方关系的各民族统治者，都要向满族可汗及后来的清朝皇帝进献贡品，这被视为是宗藩关系主要原则中最重要的一个。”[①] 杜曼认为，满族还未在中国疆域内建立自己的统治之前，就已经在同朝鲜、蒙古等国的关系中使用了这一理念。

这个问题的发展也反映在其他团队的作品中——齐赫文斯基主编的《近现代时期中国和邻居》。[②] 虽然依照时间顺序，这部作品涵盖了整个 20 世纪，但分给清朝足够多的篇幅。书中探讨了中国和蒙古、朝鲜、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关系的政策。紧随此书之后出版的是莫伊谢耶夫的书。[③]

中俄关系史研究，米亚斯尼科夫的著作

自 1970 年代末发展最为积极的领域之一就是中俄关系史研究。对这一领域的发展作出最显著贡献的是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从他开始从事科研工作起，中俄关系就是他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多年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俄关系史和中俄边界形成史方面基本学科概念的创造和定义。他这方面最有名的著作，就是通过分析大量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客观材料，最终写成专门讨论清代中俄关系史的书：《十七世纪的清帝国与俄国》[④] 和《条约业已证明：17—19 世纪中俄边界外交史》。[⑤]

米亚斯尼科夫在对档案史料长年研究的基础上锤炼得来并在其硕士论文中首次述及的基本论点，可以归结为中国和俄罗斯相互间在民族和国家利益方面并无冲突，两国之间近 400 年的全部相互交往的历史可以佐证这一点。作者强调：“中俄关系史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尽管有时会出现严峻的形势，但两国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⑥] 他的诸多著作都有力地证明，俄罗斯和中国相互关系发展的积极历史经验远远多于两国之间偶尔发生的断绝往来的事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样的纠纷和分歧很容易通过谈判订立双边条约和协定来解决，即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米亚斯尼科夫从这个角度探讨了这两个邻国之间关系史上的所有重要时刻。在这方面非常突出的文章是《尼布楚条约的历史意义》[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历史学家把 1689 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解释为对俄罗斯是不牢靠的、不完善的和不利的，因为它导致了阿穆尔州的丧失。米亚斯尼科夫在分析了条约的性质和后果后，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了更深刻的结论。他指出，这个条约毫无疑问应该考虑迫不得已的因素，即有被满洲军队包围的危险。米亚斯尼科夫进一步说，

---

① 《十七世纪清帝国的外交政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 年，第 52 页。

② 《近现代时期中国和邻居》，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 年。

③ В. А. Моисеев：《十八世纪的清帝国和萨彦－阿尔泰部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 年。

④ В. С. Мясников：《十七世纪的清帝国与俄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 年。

⑤ Мясников В. С.：《条约业已证明：17—19 世纪中俄边界外交史》，莫斯科：莫斯科地区印刷出版管理局，1996 年。

⑥ В. С. Мясников：《一个汉学家的卡斯塔利亚圣泉：七卷本》，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 卷，第 484 页。

⑦ В. С. Мясников：《一个汉学家的卡斯塔利亚圣泉：七卷本》，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5 卷，第 147—151 页。

尼布楚条约“排除武力方式解决了整整一百年的中俄关系问题”。该条约签署之后，两国都转向睦邻友好政策，相互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而这种周边国家间的关系——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因此，尼布楚条约是清帝国和俄国之间一个独特的折衷协商的例子，构成了这两个邻国间的第一次契约法行为。在前面述及的方法论原则基础上，他科学地构建了中俄国界形成的有根据的理论：“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与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大多数国家间强行划定国界不同——这不是靠战争而是双方外交努力的结果”。

在自己的书中，米亚斯尼科夫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方法来理解中俄关系史，将它们引入到比较文化的研究方式和分析方法中，并将此种关系视为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体现实例。这套研究俄罗斯和中国历史以及当今相互关系问题的综合方法，不仅要求使用大量历史人物的相关数据，而且需要在文化、社会意识和民族心理领域对复杂的过程和结果有深刻的理解。米亚斯尼科夫院士的科研贡献应该包括大量中俄关系史档案的出版。在他的研究中史料学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关键地位。对中国史料的彻底研究，以及来自俄罗斯档案馆的独家材料使米亚斯尼科夫得以开展对中国传统外交的基本特点和独特特征进行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在他的主要著作《十七世纪的清帝国与俄国》和《条约业已证明：17—19 世纪中俄边界外交史》中，米亚斯尼科夫令人信服地表明，清代外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基于来自久远过去的哲学和政治体系，而战略和战术的理论和具体方法都源自于中国古代的军事艺术。

在米亚斯尼科夫看来中国外交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细致到最微小细节的刻板的仪式，这种仪式有助于贯彻“中国”优越的概念，它的君主依据古代公认的理念统治所有国家和天下万民——“天下四方的蛮夷”。中世纪的中国理所当然地将所有曾经接触过的和曾派使者赴中国皇宫的人都视为“附庸”。在著作中，米亚斯尼科夫试图证明，清代涉及帝国对外关系的文件，包含的不仅是这些或那些外交事件的客观描述，还包括意识形态的诠释和解释，为中国皇帝作为全世界统治者的观点做一个强有力的例证。

米亚斯尼科夫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分析清朝外交的基本战略动向和方法时，能够找出其中突出的特点，如“兵法”一样，它同中国人的哲学和文化传统的特性相关联。有关“兵法”的结论是在对清帝国与俄国相互间关系史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的，并对中国外交政策史研究方法的创立有重要意义。

米亚斯尼科夫有关中国外交策略的结论赢得了世界汉学界的好评，他有一大批追随者。中国现代战略研究者之一——瑞士学者哈罗·冯·桑格尔（Харро фон Зенгер），一本有关这一主题重要著作的作者，强调了米亚斯尼科夫在世界汉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有关这一问题具体史料的发展方面的巨大贡献①。米亚斯尼科夫院士是哈罗·冯·桑格尔著作俄文版前言②的作者，这个序言以档案文献的研究为基础还原了一个事实：第一个提及中国谋略的西方代表是签订了1727 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俄罗斯外交官——萨瓦·卢基奇·弗拉基斯拉维奇 - 拉古津斯基，他对清朝的高官有如下描写：“与其骗我，不如完善他们的第二个战略。”③ 米亚斯尼科夫把谋略称为“精确的科学”，并写道：“在极大程度上谋略的概念类似于数学算法的概念。”④ 借助于米亚斯尼科夫的著作，汉学家开始明了，在中国发挥重大作用的不仅有兵法，还有用于解决大型的和复杂的外交政策任务的外交谋略。在此基础上，传统中国于战略外交所采取的手段，并不依据国

---

① Харро фон Зенгер：《谋略 1 - 36：有关中国生活和生存的艺术：三千年智慧的真正体现》，莫斯科：Эксмо，2014 年，第 12 页。

② В. С. Мясников：《谋略：精确的科学》，Харро фон Зенгер，《谋略 1 - 36：有关中国生活和生存的艺术：三千年智慧的真正体现》，莫斯科：Эксмо，2014 年，第 5—38 页。

③ 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藏：《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档》，1727 年，第 9 号第 10 页。

④ В. С. Мясников：《一个汉学家的卡斯塔利亚圣泉：七卷本》，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四卷，第 47 页。

际法的准则和原则，甚至不是依据习惯法，而是依据总体性的军事艺术理论。[①] 应当注意，这种传统手段从中世纪中国的外交中顺利传承至清代的外交中。

但是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在中国外交政策和中俄关系研究理论发展上的贡献远未局限于战略方针的研究。正是他第一次注意到中俄间相互关系历史类型学的关键问题，他注意到“尽管两国关系建立在自然形成的独特坐标系统中，其中的横向线是由欧洲的传统和理论构成的，但纵向线是中国的。其结果是，双方相互关系的形成像矢量发展一样，可得到结合了此种因素和其他方法的第三条线”。[②] 应当承认他认为“中俄相互关系按照结构特点属于单一类型，但按照文明特征——属于混合型国际关系”[③] 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非常重要。因此，米亚斯尼科夫在研究中俄关系的史料时，为研究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社会文化交往的历史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将必要的具体史实加入到社会学和文化学家的理论观点之中。后来，这些想法在其他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中得到发展。[④]

1999 年华可胜（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出版了专著《俄罗斯与中国：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理论》。[⑤] 此书的出版成为包括清朝时期在内的中俄关系史研究现代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作者开篇就正确地指出，“俄罗斯——中国关系中的一些时期曾发生过反复，并很可能在未来再发生反复”。同时在作者看来，“迄今为止，实际上还没有出现一部著作……包含对全部中俄关系史的整体分析”。[⑥] 与此相关，华可胜发表了重要看法，认为今天摆在研究人员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扩展中俄关系史的研究方法，并采用新的路径和方法研究相关问题。在专著中华可胜创立了多因素均衡的理论观点，这个理论位于他设计的范式的核心。作者认为，这个观点可以对历史情境中双边关系的动态性和延续性进行分析。华可胜谈到，“提出的概念方法为仔细观察历史情境中各种互动因素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把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做纯粹的历史研究非常困难”[⑦]。华可胜重新思考了中俄关系史各个时期最突出的问题，并在使用新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现有的史实解释了两国关系史。在我们看来，此书和该作者后来的作品成为了标志着中俄关系研究中政治学理论方法论基础建立的重要里程碑。其理论的主要内容，华可胜在其后的专著《欧亚大陆上的中国与俄罗斯：政治互动的历史动态》[⑧] 中有所阐述。

在另一本专著中，华可胜详细研究了 1881 年圣彼得堡条约签订的外交史[⑨]。在此书中他研究了众多与俄罗斯帝国同中国清朝在中亚地区划界的历史相关问题。其著作基本上涵盖了整个十九世纪下半期。华可胜指出，圣彼得堡条约奠定了未来几年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划分国界的法律基

---

① В. С. Мясников：《一个汉学家的卡斯塔利亚圣泉：七卷本》，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四卷，第 55 页。

② В. С. Мясников：《一个汉学家的卡斯塔利亚圣泉：七卷本》，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二卷，第 342 页。

③ В. С. Мясников：《一个汉学家的卡斯塔利亚圣泉：七卷本》，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二卷，第 352 页。

④ Н. А. Самойлов：《十七世纪——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与中国：社会文化关系的趋势、形式和阶段》，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14 年。

⑤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俄罗斯与中国：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理论》，莫斯科：科学教育规划出版中心，1999 年。

⑥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俄罗斯与中国：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理论》，莫斯科：科学教育规划出版中心，1999 年，第 11 页。

⑦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俄罗斯与中国：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理论》，莫斯科：科学教育规划出版中心，1999 年，第 14 页。

⑧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欧亚大陆上的中国与俄罗斯：政治互动的历史动态》，莫斯科：蚂蚁出版社，2004 年。

⑨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1881 年中俄圣彼得堡条约的外交史》，莫斯科：历史文献出版社，1995 年。

础。专著还详细研究了两国谈判时俄罗斯和清朝双方的策略。此书是在对俄罗斯、中国、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及档案馆所藏档案展开仔细分析的基础之上写成的。

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史学界还有一些历史学家的作品专门研究清朝时期中俄关系史中的个别时段或者特定问题。别斯普罗兹万内赫的书就致力于研究俄罗斯和清帝国在阿穆尔州地区的相互关系问题①。罗曼诺娃则研究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与中国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往来②。

有关十七到十九世纪中俄关系史的大型多卷本档案文献汇编的不断出版，在俄罗斯与清帝国关系史研究史料基础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俄中关系》档案文件集的编纂者有共同的关于挑选、编写和出版方面的标准。中俄关系史中最重要的文件汇编的出版，从第一卷开始就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一致称赞这套著作的优点就是将俄国、中国、蒙古和西欧各国（英国、法国、荷兰）文献的发掘和出版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多卷本的出版物可以算作是独特的了。齐赫文斯基院士指出，“这部文献汇编在世界汉学界都是独一无二的”。④

在华俄罗斯传教团史的研究

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北京传教团在中俄关系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苏联时期，客观研究它在中俄政治和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是不可能的。在当时，传教使团仅仅被视为是殖民扩张和思想侵略的工具。苏联史学界所流行的看法是，传教活动为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进行经济贸易渗透开辟了道路。

只是从 1990 年代初起才出现全面而客观地研究北京传教团历史的机会。这一领域全新研究阶段的主要发起者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在博戈柳博夫院士的倡议下，第一次科研会议“东正教在远东”，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当时的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系和圣彼得堡东正教神学院共同组织，于 1991 年 2 月 26 – 27 日召开。会议组织者的出发点是，从以修士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为首的第一个俄罗斯传教团抵达北京之日算起到 1991 年正好是第 275 周年，在这之后，开始了东正教传教团在远东持续活动的历史。会议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彼得罗夫大厅召开，大学校长梅尔库里耶夫和圣彼得堡东正教神学院院长大祭司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出席会议。第二天，会议在神学院的学院大礼堂召开。这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后俄罗斯第一次举行由神职人员和世俗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门研究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和东正教在远东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传播情况的学术会议。七十五年来这些历史在学术出版物中被压制或歪曲。最杰出的东正教传教士往往只能被顺带提及。当谈及他们的学术著作（他们对俄罗斯汉学发展的显著贡献是难以贬低的）时，作者们被迫不能使用他们的教职，只能使用他们的姓。

---

① Е. П. Беспрозванных：《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中俄关系体系下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 年。

② Г. Н. Романова：《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与中国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关系》，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公司，1987 年。

③《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第 1 卷：1608 – 1683，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 年。《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第 2 卷：1686 – 1691，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 年。《十八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第 1 卷：1700 – 1725，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 年。《十八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第 2 卷：1725 – 1727，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 年。《十八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第 3 卷：1727 – 1729，莫斯科：历史思想的纪念碑出版社，2006 年。《十八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第 6 卷：1752 – 1765，莫斯科：历史思想的纪念碑出版社，2011 年。《十八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第 5 卷：1729 – 1733，莫斯科：历史文献出版社，2016 年。《十九世纪俄中关系》档案与文件集，第 1 卷：1803 – 1807，莫斯科：历史文献出版社，1995 年。这套多卷本的档案文献汇编由齐赫文斯基主编。

④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齐赫文斯基论文集：五卷本》，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 卷，第 598 页。

平心而论，应该看到，大多数苏联东方学者的著作，对在东亚国家活动的和在对与俄罗斯接壤国家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研究中发挥突出作用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的学术贡献，给予了足够高的评价。然而，在当时所有无神论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被称为“俄罗斯商业资本手中的武器”和“沙皇政府的军事—政治工具”，被认为支持俄国沙皇的思想侵略和殖民扩张。

第一次纪念俄罗斯传教团赴华275周年的“东正教在远东”会议，标志着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突破。报告人提出的众多问题立即就成为一系列有前途的学术课题：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阿尔巴津人的东正教社区史，俄罗斯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传教团成员的学术著作，他们的外交活动。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东正教在远东”共召开了五次会议，来自圣彼得堡、莫斯科、布拉戈维申斯克、沃罗涅日和雅罗斯拉夫尔的神职人员、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都在会上作了发言和报告。在第四次学术会议上（2000年）还吸纳香港和东南亚塔斯（Лулиас）都主教参加。

五次学术会议的材料构成了《东正教在远东》[①] 四本论文集的基础（1993，1997，2001，2004年），其中包括约100篇学术论文。北京传教团的活动成为了积极研究的课题。文章中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传教活动本身，以及传教士团成员对俄罗斯—中国的关系发展和中国的学术研究做出的贡献。他们透彻地研究了传教团成员关于中国清朝的历史、经济、国家制度、汉语和满语等方面的介绍性著作。尤其要强调的是，北京传教团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人员培训中心，并在清代中国教授俄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相互关系的进程和中俄文化的相互影响。

1997年在莫斯科出版了论文集《俄国驻华传教团史》,[②] 其中收录了19世纪修士司祭尼古拉（阿多拉茨基）出版的作品《北京传教团第一阶段活动史（1685—1745）》，以及莫斯科汉学家的文章。

俄罗斯汉学界对清代在华西方传教士（天主教和新教）活动的研究兴趣，比对东正教传教团的研究要小。在这方面大概只能关注一下杜布罗夫斯卡娅[③]和罗曼诺夫[④]的专著。牧师，汉学家，历史学博士彼得·伊万诺夫在《中国基督教史》[⑤] 中阐释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各种途径和形式，特别注意俄罗斯传教士的活动。菲什曼[⑥]的遗作致力于探讨清朝时期中西文化互动的问题，以及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这个课题在俄罗斯学者中逐渐变得流行起来。

卡柳日娜娅的专著《义和团起义》[⑦] 致力于研究中国清朝统治末期在秘密社团“义和团”领导下开展的排外运动。作者研究了秘密组织“义和团”兴起的历史，其意识形态、组织模式、起义者的纲领和口号以及他们的社会成分。他特别注意研究清政府与地方当局对起义者的政策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介入。卡柳日娜娅得出结论：义和团运动，客观上明确反对帝国主

---

① М. Н. Боголюбов 主编：《东正教在远东·俄国驻华传教团275周年》，圣彼得堡：安德烈夫父子出版社，1993；М. Н. Боголюбов 主编：《东正教在远东》第1卷：《纪念日本圣徒圣尼古拉（1836－1912）》，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1996年；М. Н. Боголюбов 主编：《东正教在远东》第3卷，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2001年；М. Н. Боголюбов 主编：《东正教在远东》第4卷，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俄国驻华传教团史》论文集，莫斯科：圣弗拉基米尔兄弟出版社，1997年。

③ Д. В. Дубровская：《耶稣会在中国的使命——利玛窦等人（1552－1775年）》，莫斯科：《Крафт +》出版社，2001年。

④ А. В. Ломанов：《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⑤ Пётр. Иванов：《中国基督教史》，莫斯科：《Крафт +》出版社，2005年。

⑥ О. П. Фишман：《中国在欧洲的神话与现实（13－18世纪）》，圣彼得堡：圣彼得堡东方学出版社，2003年。

⑦ Н. М. Калюжная：《义和团起义》，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

义的压迫，尽管它具有中国人民大众正义斗争的所有缺点，但起义者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值得深深的尊重。义和团的斗争阻止了外国列强完全征服清代中国。

对清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

1980 年代苏联历史学家转而深入研究清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佳普金娜撰写了一本分析 19 世纪下半期至 20 世纪初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书。① 然而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标题的范围，因为书的前半部分专门探讨了整个清王朝统治历史时期（1644—1911）中国的社会政治组织。书中探讨了清帝国的行政—政治机构，社会阶层体系及其在清代中国社会体制中的作用，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制度特点，乡村居民的行政机构，县级管理结构，宗族及其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作用，士绅在中国乡村地区社会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还体现在合著作品《中国的社会结构：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期》② 中。作者团队包括苏联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涅波姆宁，福米娜，阿卡托娃，伊柳舍奇金，库泽斯，拉音戈尔，穆格鲁津，苏哈切娃和霍赫洛夫。这部著作的理论基础就是苏联东方学家西蒙尼亚③、赖斯纳和他们的同事④提出的社会融合概念：社会融合是开始进入到过渡时期——即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东方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部著作中，创作团队采用这个概念研究 19 世纪下半期至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作者的“传统”特指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中国模式，而“现代”是指移植到清代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而作者这两个部分的“融合”则理解为“和平共处于同一个现象中，一个能保持这两个要素间的固有平衡的结构或过程，并且通过一个部分的逐渐位移取代另一个以在冲突中共生”。⑤ 在这两种情况下，依照他们的观点，融合就是上述两个元素的相互渗透或汇合。专著的作者团队对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跨形态演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初始的封建式传统水平结构。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过渡社会的形成上，即如何从旧阶层中产生出新的阶层，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有人研究中间阶层和无阶级属性的阶层的成分和性质。按照此书作者的观点，传统中国社会，特别是清朝，是建立在底层民间小团体（家庭，宗族）和高层“共同的”大集体（国家）的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的。这种系统的特点是在纵向联系的支配下横向联系比较弱，造成了权力分布的主要原则——以国家为所有纵向联系都要向其聚集的中心，按照这些作者的观点，可以用术语“等级国家”⑥ 来形容。

类似的想法可以在涅波姆宁和梅尼希科夫的《在过渡社会中合成》⑦ 中找到更多种理论形态的反映，此书的作者试图追寻过渡时期中国社会中封建形态的解体和“融合”的生成。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文化特征的严肃研究，开始在国内汉学家有关中国民族史的集体作品中出现，这部书的作者有刘克甫（М. В. Крюков），马利亚温，嵇辽拉（Л. С. Переломов），苏敏（М. В. Софронов）和切巴克萨洛夫。这些作者所写的六本书，是有关整个五千年历史中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独特百科全书。这一系列中的第五本书专门讨论明清时期中国人的

---

① Н. И. Тяпкина：《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村庄和农民（19 世纪下半期——20 世纪初）》，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 年。

② 《中国的社会结构：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 年。

③ Н. А. Симония：《东方国家：发展道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 年。

④ 《东方社会的演变：传统与现代的综合体》，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 年。

⑤ 《中国的社会结构：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4—5 页。

⑥ 《中国的社会结构：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8 页。

⑦ О. Е. Непомнин，В. Б. Меньшиков：《在过渡社会中合成》，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99 年。

民族史（至19世纪）,[①] 而第六本则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民族史[②]（因此，清代民族史的最后时期在此卷中）。这些作者探究和转述史料的方法与研究过这个时代的其他史学家的作品非常不同。他们首先研究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的历史变迁，在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方面，专注于汉民族共性的文化特点的研究。他们感兴趣的是人口的变化，居民的民族构成，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服饰的特点，食物和许多其他东西。

对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俄罗斯汉学界又重新燃起了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兴趣。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最有趣的当属卡柳日娜娅和博罗赫的作品。卡柳日娜娅在其专著[③]中，以晚清时期中国杰出的革命运动理论家之一——章炳麟（章太炎）的社会—政治观点为例，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概念与西方社会科学成就的融合问题。卡柳日娜娅写道："章创立的革命理论综合了革命进程的国家概念，即朝代更替（"权力更迭"）是如何随着本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转型而发生的。"[④] 博罗赫在其专著[⑤]中探讨了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儒家学者如何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哲学的遗产并发展这些她在前一本书中描述的思想问题。[⑥]儒学改革事业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梁启超。此书作者力图表明，梁启超是如何在利用欧洲知识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道德－政治学说，并提出了"新民"理论的现代诠释，这一理论作为中国哲学解释观点之一的结果记载在儒家经典《大学》的注文中；儒学改革者梁启超是如何对传统政治理论和旧礼教最重要的宗旨加以重新审视的。

博罗赫的这部著作受到了俄罗斯汉学界的高度赞扬。齐赫文斯基院士对它作出如下评价："这部广受好评的专著的作者成功地应对了极为复杂的、从前从未有人做过的展示社会思潮对中国儒学改革者的影响的课题，这对19至20世纪之交的人类文明交流史和中国革命和改革史上复杂问题的研究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⑦]

这一类致力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作品中，还应该包括克鲁申斯基所著有关中国杰出思想家、教育家严复的作品的书。[⑧] 作者力图说明严复的翻译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他详细考察了严复的哲学观点及其与张之洞的论战。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史专家弗拉吉研究清朝时期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林则徐的历史作用和思想观念。在其书中[⑨]弗拉吉详细记述了这位主张抵制外国势力扩张并加强爱国主义

---

① 刘克甫（М. В. Крюков），В. В. Малявин，苏敏（М. В. Софронов）：《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中国民族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② 刘克甫（М. В. Крюков），В. В. Малявин，苏敏（М. В. Софронов），Чебоксаров Н. 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③ Н. М. Калюжная：《传统与变革：章炳麟（1869－1936）——中国近代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

④ Н. М. Калюжная：《传统与变革：章炳麟（1869－1936）——中国近代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⑤ Л. Н. Борох：《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儒家思想和欧洲思想，梁启超：新民理论》，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⑥ Л. Н. Борох：《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初）》，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⑦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文明融合的经验》，《近现代史》2003年，第1期，第192—199页。

⑧ А. А. Крушинский：《严复作品和翻译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⑨ С. Ю. Врадий：《清代中国的爱国者、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林则徐》，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

思想的反鸦片贸易斗士的生平。弗拉吉还指出，林则徐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发展中的贡献是显著的（新观念体系的形成，对学习西方知识必要性的判断，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弗拉吉提到，林则徐不仅主张加强中国的陆军和水师，而且还提出了改变现有的财政—经济、税收制度和改善农业生产各要素的具体措施。弗拉吉还指出，林则徐对被公认为是“仿效海外事务”（洋务运动）思想创始人的魏源有巨大影响。

1996 年弗拉吉出版了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图书馆储存的独家木刻本——林则徐的著作《俄罗斯国纪要》——和载有他评论的译本。① 弗拉吉提到，林则徐的作品在中国是首批全面关注俄罗斯的作品之一，并指出林则徐的这部作品是研究清代中国对俄罗斯国家认知形成史的重要史料。

2000 年代的清史研究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俄罗斯的中国史出版物数量同之前时期相比出现下降。这与老一代中国史学家的自然离去和掌握中文的新一代更愿意从事实践活动而非学术活动有关。在俄罗斯的汉学学者数量同苏联时期相比大为减少。然而，在这个时候还是出现了不少有关清朝时期历史的令人感兴趣的研究。

正是在 2000 年代俄罗斯汉学家们准备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史的总括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对清朝时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 21 世纪之交，由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专家们编写的《中国史》一书出版了（涵盖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远古时代直至今天），② 皮萨列夫所写的三章涵盖了清朝时期。在评估了满族征服中国并建立清王朝统治的影响之后，作者断言，满族的入侵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牺牲，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而且满清的统治伴有严酷的民族压迫。同时，在皮萨列夫看来，在清朝统治下的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达到了鼎盛时期。他指出，“从基本的社会制度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呈现出稳定状态”。③ 在皮萨列夫看来，帝制时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确定起主要作用的是官僚：“换句话说，帝制中国的发展——这是绅士阶层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清代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儒家社会观念的完美体现，在这里进入社会高层的资本不是出身名门望族和财富，而是依靠知识和教育。这个历史经验与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形成过程在本质上完全不同……”④ 19 世纪中期，在皮萨列夫看来是中国历史上的转变时期，当时国家被强行并入由在全世界发展的欧洲流派创造的文明模式中。

清史在著名俄罗斯汉学家尼基福罗夫的概论性著作《中国史概要》⑤ 中也有一席之地。清朝时期在此书的 448 页中占据了 135 页。尼基福罗夫将注意力集中于满族对中国的征服和统治精英逐渐汉化等方面。在此情况下他指出，正是在 18 至 19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出现了尤为明显的、有全球史意义的决裂，这长期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2005 年涅波姆宁的巨著《中国历史：清王朝》出版⑥，整本书都致力于研究清代的中国历史。此书考察了清朝的全部历史：从满族国家的建立经过社会—政治危机到王朝灭亡。涅波姆宁

---

① 林则徐：《俄罗斯国纪要》，译自中文，С. Ю. Врадий 引言及注释，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② А. В. Меликсетов 主编：《中国史》，第 3 册，莫斯科：“ОНИКС 21 世纪”出版社，2004 年。（此书多次再版）。

③ А. В. Меликсетов 主编：《中国史》，第 3 册，莫斯科：“ОНИКС 21 世纪”出版社，2004 年，第 295 页。

④ А. В. Меликсетов 主编：《中国史》，第 3 册，莫斯科：“ОНИКС 21 世纪”出版社，2004 年，第 295 页。

⑤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中国史概要：公元前两千年至二十世纪初》，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出版社，2002 年。

⑥ О. Е. Непомнин：《中国历史：清王朝——十七至二十世纪早期》，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2005 年。

从朝代和社会—政治循环的角度探讨中国的全部历史。从外部看，也就是作者的角度，清帝国是相当繁荣的国家：富有的城市，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和贸易，百花齐放的科学。同时，在他看来，不同于历史上呈现出线性运动的西欧模式，中国从汉朝开始直到今天，都在按照另外的剧本发展。涅波姆宁将清代的历史分为两个周期：独立自主的清朝持续了 206 年，还有太平天国时期（80 年）。“鸦片” 战争之后，新旧两种社会类型的演变在中国并存（周期性的和线性的）。涅波姆宁认为，正是这种清朝统治末期在中国出现的过渡系统形态的特殊性，导致了君主制的灭亡和共和国的建立，这个特性在他之前的著作中也有所说明。

涅波姆宁的这种方法招致来自俄罗斯一些汉学家的反对甚至批评。齐赫文斯基院士如是写道：“涅波姆宁在其书中主张坚定拥护历史进程中的人口发展周期论……这个理论没有考虑到统治中国的这个或者其他王朝时期影响死亡的各种因素。”①

出版于 2015 年的《从古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史》② 中的第六本也涵盖了清朝统治时期。和这十卷本著作中的其他卷一样，它致力于所有中国社会和国家的多样性的综合研究。第一部分的各章（作者：涅波姆宁，庞晓梅，佐托夫，齐赫文斯基，丘多杰耶夫）主要研究在文中同经济史紧密相连的政治史问题，与军事史事件有关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体系，与社会史有关的外交和外交政策史，与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知名人士的活动有关的文化史事件。第二部分作者们（涅波姆宁，科布泽夫，华可胜，杜布罗夫斯卡娅，涅格林斯卡娅，利用彼得罗夫，李福清（Б. Л. Рифтин）和菲什曼的材料）的注意力集中在清代的精神生活问题上：文学，哲学，建筑和绘画。此书探讨了包括俄罗斯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在俄罗斯汉学形成中的作用在内的中俄关系问题（作者——米亚斯尼科夫）。这一卷是过去十年俄罗斯清史研究的总结。

对中国清史的研究出现了全新的方向。2009 年在米亚斯尼科夫院士的倡议下开始编纂一套新书，名为《中国清代历史的非传统史料（1644—1911）》。该系列的第一版——图集《清代的北京：人民生活的图画（民俗画）》包括一些保存在圣彼得堡东方文学研究所的中国专辑插图。③ 出版民俗画专辑——“人民生活的图画”——它们是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的、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些图画描绘了街景、工匠、商人、风俗和礼仪，娱乐等等。这种绘画形式在清朝统治时期得以广泛传播，并与当时来自欧洲国家对中国有兴趣的人有关。遥远神秘的国度激起了他们的兴趣，而当时缺乏可以纪录中国人生活的摄影器材，这导致了描绘从事日常活动的普通人的绘画专辑的出现。每张图都用中文做了注释性题词。民俗画在制作技术和创作风格上都与“年画”相同。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库藏中有一些早年带来俄罗斯的民俗画专辑。其中的两个选入了这套书中。保存在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出版图画的原件——波波夫（1828—1870）藏品中的两个专辑，他是第 14 届驻北京俄罗斯传教团的留学生，随后做了俄罗斯驻天津领事馆的秘书。第一个专辑包含 108 幅图，第二个包含 110 幅。图画用彩色水溶性颜料在薄的白纸上绘成并依照主题分类。这些画上绘有从事自己专业活动的工匠，各种商品的经销商，学者和军人等等。从中文翻译成俄文的工作是由波波娃完成的，他还写了介绍性的文章，文章详细讨论了风俗画在中国存在的历史，介绍这些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东方学档案库和手稿征集处的专辑，且概述了波波夫的生平。对民俗画的研究在俄罗斯学术界还是首次进行。专辑是丰富的史料和反

---

①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对满清统治中国论述的几点思考（与涅波姆宁的书相关）》，《齐赫文斯基论文集》第 6 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53 页。

② О. Е. Непомнин 主编：《从古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史：十卷本》，第六卷《清朝（1644 – 1911）》，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5 年。

③ И. Ф. 波波娃引言、中文翻译和注释：《清代的北京：人民生活的图画（民俗画）》，圣彼得堡：斯拉维亚出版社，2009 年。

映风俗文化的资料。这套专辑的出版，将有助于学者重建清代北京的真实生活，这对现代研究非常重要。

此书出版之后，还有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雅金甫神父（1777—1853）专辑的复制品出版——雅金甫是优秀的俄罗斯汉学家，第九届驻北京传教团的领导。《第一专辑》出版于 2010 年，标题是《有关居住在从乌苏里江到入海口的阿穆尔河岸边的、从朝鲜边界到俄罗斯边界的所有东海岸边和定居在围绕海岸的所有岛屿上的人们》,① 包括了 57 个彩绘及雅金甫神父为其做的注释，包含着一份独一无二的民俗文化资料。出版的这个专辑带有附录，是有关雅金甫神父生平和著作以及这本专辑的学术文章的合集。

稍晚，在 2012 年，出现了一个包括雅金甫神父“第二”和“第三”专辑绘画出版合集在内的、设计类型相同而又彼此互补的出版物。② 在这些专辑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服饰，从高官到音乐家到乞丐等中国居民的不同阶层代表，以及蒙古人、朝鲜人、西藏和中亚地区居民的形象。在《第二专辑》中雅金甫神父对所有图画都做了注释，包括最后创作的两幅作品。如同“第二部”剩余的作品一样，“第三”专辑收录有从外观上看是中国艺术家一些作品的复制品。根据相关文献判断，《第三专辑》是雅金甫神父从中国返回后于 1822 年进献给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这些专辑的出版使这些资料得以提供给广大清史研究者使用。

类似的出版物还应该包括圣彼得堡汉学家出版的《北京民间画艺术家周培春集》。③ 书中收录了艺术家周培春——清代中国民俗画流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的 117 幅画，这些画保存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研究所图书馆中。在这个双语出版物（中文和俄文）中，编译者们按照图画的主题把这些画分为四个部分并为其定了标题：第一部，《北京日常生活场景》；第二部，《北京店铺招幌》；第三部，《北京市民画像》；第四部，《中国古代美女画像》。所有四个专辑作为教授—汉学家斯梅卡罗夫（1877—1955）的私人文库的一部分，由大学于 1955 年购得。这些专辑的出版是清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特别是在研究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史方面，丰富了现代历史研究的主题并添加入新的内容，得以把研究引入微观日常生活史的轨道。

对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库藏乾隆朝将军们的肖像研究也很有趣。④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多罗宁教授在清代历史编纂研究领域从事了多年重要工作。在成为其长期学术研究独特成果的专著中,⑤ 多罗宁详细描述了清代国家修史的形成和组织的历史，包括地方当局的历史文献编纂活动。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得出了有关 17 至 18 世纪清代历史编纂学的非凡成就及其巨大生产率的结论。大量学者—史学家的活动正与这个时期相一致——涌现出大批大部头著作的作者。多罗宁断言，帝制中国时期的历史编纂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独特现象，世界上没有与此类似的现象；他还指出，中国“连续几个世纪以来，按照自己极其完美的史学传统把历史转变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影响社会的、培养历史意识的工具”。⑥

随着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提出，近日在俄罗斯历史学界又兴起了对中俄关系史

---

① 《第一专辑》，见雅金甫：《研究与评论》，О. В. Васильев 编译，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2010 年。

② 《雅金甫的“第二”和“第三”专辑》，В. С. Мясников 和 О. В. Васильева 前言，О. В. Васильева 制作出版，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2012 年。

③ Д. И. Маяцкий 主编并编译，П. В. Рудь 和 Ю. С. Мыльникова 编译：《北京民间画艺人周培春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高尔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科学图书馆东方部库藏，圣彼得堡：“人民党打印工作室”出版社，2016 年。

④ Т. А. Пан，Н. Г. Пчелин：《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乾隆皇帝统治时期著名将军的肖像》，《东方书画文献》，2011 年，第 2 期，第 262—278 页。

⑤ Б. Г. Доронин：《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华帝国的历史编纂》，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言系，2002 年。

⑥ Т. А. Пан，Н. Г. Пчелин：《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乾隆皇帝统治时期著名将军的肖像》，《东方书画文献》，2011 年，第 2 期，第 235 页。

的研究兴趣。率先以社会文化角度研究清代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史的是彼得堡汉学家萨莫伊洛夫。① 他在专著的第一章提出了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引入了自己定义的社会文化互动理论。在随后的章节中作者介绍了 17 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文化特征和在两国经常出现的、对此时期而言较为典型的地理文化形象，按时间顺序从两个社会相互认同的过程的角度出发，概述了 17 至 20 世纪初中俄关系史中的主要事件。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在此书中也被视为是社会文化互动中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书中还探讨了北京传教团在两国文化交往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清朝时期中国艺术在俄罗斯的传播，清朝外交官的对俄访问和出现在俄罗斯的第一批中国学生。萨莫伊洛夫详细研究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社会文化互动的交流渠道和接触地带，最关注的地方是作为中俄地缘文化互动的空间和特殊接触地带的恰克图和买卖城。此书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探讨在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和俄罗斯在华形象的形成、俄罗斯人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适应和俄罗斯文化成分向中国的渗透。

萨莫伊洛夫所得出的研究结果，赢得了许多俄罗斯和国外学者的积极评价。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写道："萨莫伊洛夫的专著解决了一个学术意义上的重要问题——在国内外史学界第一次用社会文化互动理论分析 17 至 20 世纪初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② 诺维科夫和梅利尼科夫指出："总而言之，评论家们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萨莫伊洛夫的专著《十七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与中国：社会文化互动的趋势、形式和阶段》代表了以作者开创的采用多角度、宏观的、跨学科的方法论——社会文化互动理论为基础进行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新时代。这无疑是我们汉学界一个有意义的事例。同时，这部在多方面都有创新的著作中维护和保持了诸多俄罗斯汉学界的优秀传统。"③ 萨莫伊洛夫在其书中所作的主要结论，还获得了其他评论员的称赞。④

2003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历史学家彼得罗夫出版专著《1856—1917 年旅俄华侨史》。⑤ 作者在这本基于大量档案材料写成的书中，试图呈现出一幅清朝末期俄罗斯土地上的中国移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广阔画卷。书中探讨在俄罗斯不同地区，主要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口数量的动态变化，他们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不同地区和省份中的定居点，中国人的法律地位，他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在俄罗斯的经济生活中中国人群体的作用集中于特殊部门：从事农业生产，远东地区金矿中的工作，在乌苏里、阿穆尔地区的工程及其他地区的铁路建设中使用中国劳动力。有单独的一章专门讨论旅俄中国人的文化问题。此章在俄罗斯档案馆藏文件的基础上分析旅俄华人的生活、住房、食品、衣着和外观，中国人同俄罗斯远东地区土著居民和旅俄朝鲜人之间的关系。这本书是一个有充分根据的长期研究，并且是旅俄华人群体的产生和存在的专门史研究领域中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书中包含有引用自俄罗斯档案馆馆藏文件的大量史实，引用来自档案文献的冗长引文，许多文件被全文复制。可以说，这一专著的问世不仅是旅俄华侨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还有助于扩大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史料基础。

---

① Н. А. Самойлов：《十七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与中国：社会文化互动的趋势、形式和阶段》，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14 年。

② В. С. Мясников：《可靠的历史文化对话》，《远东问题》，第 3 期，2005 年，第 163 页。

③ Б. М. Новиков，Ю. С. Мыльников：《俄罗斯和中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历史》，《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通讯》，第 13 集，《东方学 - 非洲学》，2016 年，第 1 期，第 135 页。

④ Гончаренко С. Н.：《书评：Н. А. Самойлов〈十七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与中国：社会文化互动的趋势、形式和阶段〉》——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14 年，368 页。《近现代史》第 2 期，2016 年，第 200—203 页。И. Б. Кейдун：《书评：Н. А. Самойлов〈十七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与中国：社会文化互动的趋势、形式和阶段〉》——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14 年，368 页。《东方》2015 年第 5 期，第 174—178 页。Di Toro A.：《〈十七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与中国：社会文化互动的趋势、形式和阶段〉，几点由尼古拉·萨摩耶夫洛夫的专著启发的观察》，《明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90—330 页。

⑤ А. И. Петров：《1856—1917 年旅俄华侨史》，圣彼得堡："桦树皮"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社，2003 年。

从事研究俄罗斯中国移民史的还有拉林。但是其作品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二十世纪，而对清朝末期研究的不够细致。①

2000 年代还有一些有关中俄关系史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涵盖清朝时期（达齐申的研究②，瓦列耶夫和戈尔舒诺夫③，布拉戈杰尔④），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

总之，俄罗斯汉学家们在清代中国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为将这段历史展现给俄罗斯读者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劳动。最大的成就是在 19 至 20 世纪初中国史研究和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至于 17 至 18 世纪的清代中国史，尽管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些涉及这个时期的作品，但显然还是不够的。

《李文海文集》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原党委书记李文海教授，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教育家。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学科评议组组长。他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是新时期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奠基者，是新中国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主要领导，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突出的贡献。他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进行了系统、深入和富于开拓性的探讨，撰写和主编了大量著述，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灾荒与饥馑》、《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清史编年》（共 12 卷）、《清通鉴》等近二十部学术著作，发表《告别二十世纪的历史思考》、《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等论文近五百篇。编纂、出版《李文海文集》，不仅助益学术界和教育界，而且是对李文海先生的最好纪念。《李文海文集》全面展示了李文海教授一生的学术成就和教育思想。它的出版，对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对于弘扬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大学精神、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都具有重要意义。

《李文海文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9 月出版。

---

① А. Г. Ларин：《旅俄华人的昨天和今天：历史概况》，莫斯科：蚂蚁出版社，2003 年；А. Г. Ларин：《中国移民在俄罗斯》，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2009 年。

② В. Г. Дацыше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俄关系史概要》，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师范大学编辑出版部，2000 年。

③ Р. М. Валеев，В. С. Горшунов：《国内史学界（二十世纪 40 – 80 年代）的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俄关系研究》，喀山：喀山大学，2011 年。

④ Ю. Г. Благодер：《俄罗斯游客和外交官眼中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克拉斯诺达尔：库班国立工业大学，2008 年。